

毛泽东与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田 刚

摘 要: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鲁迅的理解,是按照“六经注我”的方式,从自己革命家或政治家的价值立场出发而进行的。在毛泽东的视域中,鲁迅并不是周海婴心目中以“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韧性坚守”为基点的启蒙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的“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与鲁迅,两者对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出路,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等方面的看法和主张,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鲁迅所谓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但毛泽东却充分借重了“鲁迅”这一思想资源,并按照自己的话语方式,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掌控了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话语权,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毛泽东之选择鲁迅,是为了“神道设教”、统一思想的历史需要。无视这一基本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及存在,把毛、鲁迅为一体,认为鲁迅是“通向毛泽东的独木桥”,从而对鲁迅恣意拔高或大加挹伐,都是非历史的,更非理性的态度。

关键词:毛泽东;鲁迅;“五四启蒙主义”;文艺与政治;文化霸权

毛泽东与鲁迅,一个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一个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精神偶像。研究二者的关系,也就是中国现代的政教关系,不仅是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重要课题,更是关乎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敏感性话题。多年以来,鲁迅与毛泽东,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是一体之两面。研究者多是在毛泽东“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这句话指引下,探讨的是毛泽东与鲁迅“相通”或“相同”的一面,证明的是二者的一致性。但自2001年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抛出著名的“毛罗对话”之后,使上述结论遭遇到空前的挑战。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毛泽东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那为什么还要把“鲁迅”关进牢房呢?或者是,在精神价值上如果毛泽东与鲁迅存在着根本的冲突,那为什么还要封鲁迅为“新文化的旗手”,并让他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呢?这也就是说,毛泽东与鲁迅,这两个20世纪中国新文化的巨人,在精神价值上存在着复杂和吊诡的历史联系。如何解释这一思想和历史的纠结并弄清这一纠结所产生的精神或历史的缘由,将是本文的主要目的所在。

一、毛泽东与鲁迅的三次“神交”

在鲁迅研究史上,毛泽东的“鲁迅论”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们知道,正是在毛泽东那里,鲁迅才开始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旗手”,并且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此之前甚至之后,再没有比之更高的评价了。很难设想,假如没有毛泽东,20世纪的鲁迅研究会是什么样的局面。但

作者简介:田刚,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陕西西安 71006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11&ZD113)及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鲁迅与延安文艺思潮”(09XJA751003)的阶段性成果。

是,这两位 20 世纪政教两个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却没有一面之缘。他们之间的“接触”或“对话”,基本上是一种“神交”。据现有的资料记载,毛泽东在 1940 年确立鲁迅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旗手”之前,曾经有三次接触并“神交”鲁迅的机缘:

第一次是在“五四”时期。关于毛泽东与鲁迅发生“关系”的最早记载,是《周作人日记》。1920 年 4 月 7 日,周作人日记中出现了“毛泽东君来访”的记录^①。是时,毛泽东刚刚起草完在岳麓山一带建设“半耕半读”的新村的计划书,并将其中《学生之工作》一章发表于 1919 年 12 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趁第二次赴北京之机,拜访中国新村运动的倡导人周作人。当时周作人与其长兄周树人(鲁迅)刚刚从绍兴会馆搬至八道湾十一号新宅不久。那么,毛泽东在拜访周作人时,鲁迅是否也在场呢?查 1920 年 4 月 7 日《鲁迅日记》,仅云:“晴。午后会议”,并无毛、鲁会面的记录。后来在瑞金时期,毛泽东还不无遗憾地告诉冯雪峰:“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②1954 年,负责审阅《鲁迅全集》注释的胡乔木曾就毛泽东与鲁迅是否会过面一事,面询过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断然回答说:他早年在北京,是会过不少名人的,见过陈独秀,见过胡适,见过周作人,但没有见过鲁迅^③。尽管有人也曾就周作人的这点记载,煞有介事地编造出了“鲁毛会面”的佳话,但其证据已被证明是不可靠的^④。也就是说,毛泽东和鲁迅并没有见过面。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周氏兄弟”齐名,毛泽东为什么要去拜访周作人,而不去拜访他后来高度推崇的鲁迅呢?这应该与毛泽东早期所热衷的“乌托邦”理想有关。早在 1918 年 6 月,毛刚从第一师范毕业时,曾与蔡和森、张昆弟等跑遍岳麓山,想找一个地方建立“新村”,试验新生活。后来又为建设“新村”起草过计划书,并将计划书中的《学生之工作》一章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他在序言中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按:即 1918 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按:指 1919 年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想把学校、家庭、社会结合为一体,建立起“人人作工,人人读书,人人平等”的新社会生活。“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矣。”^⑤这种半工半读、自由研究学术的“工读同志会”的理想,在 1918 年 8 月未去北京之前,曾写信告诉蔡和森,因此蔡 1918 年 7 月 24 日的回信表示赞同:“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⑥由此可见,毛泽东趁第二次进京之机专门拜访周作人,一定是想从这位中国现代“新村”运动的倡导者那里得到对于“新村”的更深理解和更多支持。因为周作人不但中国“新村”运动的理论倡导者,而且还曾对由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在九州向日所建立的“新村”所在地——石河内村进行过实地考察。周作人对于“新村”的理论倡导,在当时即得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蔡和森、恽代英、毛泽东等人的响应。在北大,李大钊还与周作人共同发起“工读互助团”,其“募款启事与简章”宣称,其宗旨在于“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与职业合一的理想”。毛泽东等人设计的岳麓山“新村”计划,也是当时“新村”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周作人所倡导的“新村运动”,在得到李大钊为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热烈赞同的同时,却在其胞兄鲁迅那里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冷遇甚至反对。在写给钱玄同的信中,鲁迅认为周作人宣称新村

① 《周作人日记》(中),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年,第 115 页。

② 陈琼芝:《在两位未谋一面的历史伟人之间——记冯雪峰关于鲁迅与毛泽东关系的一次谈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 年第 3 期,第 208 页。

③ 陈漱渝:《一场应该结束的辩论》,《团结报》1982 年 12 月 4 日;唐天然:《毛泽东没有会见过鲁迅》,《书林》1982 年第 5 期。

④ 参见宋贵伦:《鲁迅研究中的一段历史公案》,《毛泽东思想研究》1992 年第 2 期。

⑤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年第 2 版,第 455 页。

⑥ 《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22 页。

运动的文章,“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的”^①。在小说《头发的故事》里,鲁迅更借主人公之口,提出了自己的质问:“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②鲁迅显然不满于周作人们对于乌托邦理想的过分沉溺,他是一直主张立足于现实的更切实的战斗的。他曾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披露过此中的深在缘由:“你的反抗,是为希望光明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偏与黑暗捣乱。”这里鲁迅虽是说给许广平的,但实际上宣示出的乃是自己与周作人、李大钊、毛泽东等在思想上根本的歧异之处:周作人等所倡导和渲染的“新村”,是一种历史的“黄金时代”或社会的“乌托邦”。他们反抗现实,是为了实现“理想”。而鲁迅反抗现实,则是为反抗而反抗——鲁迅对于“黄金世界”或“乌托邦”的实现,是持质疑或不相信的态度的。鲁迅这种“反抗绝望”的思想或精神特质,在毛泽东这种为理想而奋斗的革命者看来,显然是偏于消极和颓唐,当然也是不可取的:不为理想而奋斗,不去再造一个“新世界”,仅仅是为了“捣乱”或反抗,这种思想和无政府主义又有什么差别?难怪鲁迅在同一封信中紧接着又露出了自己思想的血肉:“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有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将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③这里,“个人的无治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又一称呼。这样一个在“人道主义”和“个人的无治主义”两种思想之间徘徊的鲁迅,能是怀着重整河山之鸿鹄大志的青年毛泽东所心仪的对象吗?

毛泽东与鲁迅的第二次“接触”是在瑞金时期。这时,是1933年底到1934年1月,冯雪峰因叛徒出卖险遭毒手,已被迫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而毛泽东已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被排挤出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他心情抑郁,为了避免牵连而有意回避别人,但听说冯雪峰是从鲁迅身边来的,破例主动找其攀谈。对此,冯雪峰回忆道:

一九三三年底,我到瑞金中央苏区去之后,常有机会见到毛主席。他那时受王明路线排斥,不担任党中央的领导职务,时间比较多。有时他约我到 he 那里,有时他自己踱到我的住处来。有几次他说:“今晚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毛主席早就知道鲁迅,他曾遗憾地跟我讲过:“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

我当时曾告诉他,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一九三三年末,我担任中央苏区党校教务主任,党校校长是张闻天同志。有一次他和几位中央领导闲谈,谈到一些干部的人选,当时我也在场。他们谈到有人反映苏区教育部门的工作有点事务主义,张闻天想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问我他能不能来。我说他是党员,让他来一定会来的。后来由我起草了电报拍到上海,秋白就服从党的决定到苏区来了。议论中,博古认为也可以让鲁迅来担任这个职务,说鲁迅搞教育行政很有经验。后来我向毛主席讲起,毛主席是反对这种意见的,他说:“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我还曾告诉过毛主席,鲁迅读到过他的诗词,认为诗词中有“山大王”的气概。毛主席听了,又是开怀大笑。^④

冯雪峰还回忆说:“有时中央党校杀了猪,雪峰就请毛泽东同志来会餐,有时发了津贴两人就一

① 1919年8月13日《致钱玄同》,《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366页。

② 《鲁迅全集》第1卷,第465页。

③ 《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9页。

④ 陈琼芝:《在两位未谋一面的历史伟人之间——记冯雪峰关于鲁迅与毛泽东关系的一次谈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期,第208页。

道下小馆。两个人一起散步交谈不下数十次。他们畅谈文学,畅谈诗歌,畅谈上海文艺界的活动,畅谈共产党员的文化人和进步作家反对反动派残酷野蛮屠杀和压迫的英勇斗争。”^①而这些谈话,总是围绕着鲁迅的革命活动而展开的,对鲁迅先生的斗争、写作、身体状况,结交的朋友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毛泽东同志都非常关心,反复询问。毛泽东还告诉冯雪峰: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睬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理论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许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睬,不支持。应当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说他自己也想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②。

通过冯雪峰,瑞金时期的毛泽东开始了解和认识了鲁迅——尤其是他对中国革命的价值和作用。

但毛泽东真正深入地理解鲁迅,还是在党中央进驻陕北以后。1936年4月,冯雪峰接受党中央委派去上海前夕和1937年2月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期间,毛泽东又多次和他长谈。在黄土窑洞中,在油灯下,毛泽东和雪峰长谈了十多个夜晚^③。他们回忆长征,谈“双十二”事变,谈中国革命的形势,也谈到鲁迅的追悼会,谈到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斗争和上海各个方面的情况,等等。毛泽东一再关切地询问鲁迅逝世前后的情况,表示了对鲁迅的怀念之情。毛泽东还谈到关于鲁迅和鲁迅作品的一些评论。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关注鲁迅,是因为在此期间,正是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著作之时。1937年1月,毛泽东进驻延安后,他在设在此地的陕西第四中学图书室发现有鲁迅的书,如获至宝。他借了几本,读后再借,先后三次借阅。最后,他读了这里所有的鲁迅选本和单行本^④。后来,毛泽东回忆起这一时期的阅读体验时,曾这样讲过:“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⑤1938年1月12日,他曾回信时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的哲学家艾思奇,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⑥其实,这时所谓的《鲁迅全集》还没有出版,但由此可以说明毛泽东还是非常渴望系统地阅读鲁迅的。1938年6月,由上海复社出版的20卷本的普通版《鲁迅全集》开始发行。在此之前,早在5月份时,周恩来已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为延安预定了《鲁迅全集》的精装本和平装本各十套(后来送到延安时实际上各为八套)。这年8月,《鲁迅全集》又特印了200套编号发行的布面精装“纪念本”,在每册的版权页上注明为“非卖品”。这其中的58号就是送给毛泽东的,从此,毛泽东才真正拥有了《鲁迅全集》。后来新华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工作的摄影图片,图片中,办公桌上放着3卷厚厚的《鲁迅全集》,书脊上的书名字迹依稀可辨。

那么,通过对“鲁迅”的进一步接触和了解,毛泽东从其中读出了什么呢?

二、“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现存的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谈论鲁迅的有关记载,是1937年3月1日他与前往延安访问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在谈话中,针对“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后所形成的政治局面被某些犯了

① 冯夏熊:《冯雪峰传略》,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编:《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53页。

② 唐弢:《追忆雪峰》,《文汇报增刊》1980年第1期;收入《回忆雪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03页。

③ 冯夏熊:《冯雪峰传略》,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编:《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5页。

④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14页。

⑤ 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184页。

⑥ 毛泽东:《致艾思奇》(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8页。

“左派幼稚病”的人所指责的现象,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回敬道:“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按:即在“西安事变”后与国民党的谈判)叫做‘屈服、投降和悔过’。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上,描写了一个叫做阿Q的人,这个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这类人物的。”^①但毛泽东在这里只是拿阿Q做比喻,以增加谈话的丰富性和形象性而已,对鲁迅及其作品并无实质性的涉及。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对鲁迅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的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这可以说是给予鲁迅最高的“谥号”!还有能比“圣人”更高的溢美之词吗?问题在于,毛泽东为什么要给鲁迅如此高的评价呢?主要还是看中了鲁迅之于“中国革命”的价值: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毛泽东这里是从政治革命的视角,来论述“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的:“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但仅仅做一个“急先锋”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是要在思想上“入党”。紧接着,毛泽东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的定义,就让鲁迅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党的鲁迅”了。而为了证明鲁迅的“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身份,毛泽东随即又列举出了鲁迅的“三大特点”:“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最后他总结说:“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②

其实,毛泽东是完全按照一个“革命家”的标准来总结“鲁迅精神”,塑像鲁迅的“红色战神”形象的。尽管“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确实是鲁迅精神中的重要元素,但鲁迅思想和精神中更为核心的成分,也就是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所总结的“鲁迅的真精神”的四大元素,即“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韧性坚守”^③,毛泽东却无一提及。这里的问题倒不在于非要辨析出谁总结的“鲁迅精神”更逼真,笔者只想说明的是,上述毛泽东的“鲁迅论”只是从革命家或政治家的视角,而不是从一个启蒙思想家的视角(周海婴心目中的“真鲁迅”)来看待鲁迅的。但仅仅从革命或政治的视角来看待鲁迅,显然离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即周海婴所谓的“鲁迅的真精神”相去还有一段距离。毛泽东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仍然沿着上述《论鲁迅》的思路继续前进,进一步丰富他更为宏大的“鲁迅论”。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下列三篇文献:

第一篇文献是1938年4月28日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在这篇讲话里,毛泽东一开场就以徐志摩为例批驳了所谓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并认为“艺术至上主义者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论”。接着,又以鲁迅为例谈到了艺术上的“统一战线”问题,实际上就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现在为了共同(的)抗日在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写现实主义派或是浪漫主义派,是共产主义派或是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当然对我们来说,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我们这个艺术学院便是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我们在艺术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④

① 毛泽东:《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479页。

② 毛泽东:《论鲁迅》,《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11页。

③ 周海婴:《鲁迅究竟是谁?》,《语文新圃》2006年第11、12期。

④ 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第15-16页。

毛泽东这里所引用的鲁迅的话,来自鲁迅在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中所写的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该文中,鲁迅的原话是:“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①这也就是说,艺术家完全可以在“抗日”的大旗下结成“统一战线”。这一点,即政治层面上的“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的论述与鲁迅是一致的。

但问题在于,艺术家在政治上结成“统一战线”之后,在艺术上是否也需要一个“统一战线”呢?在后一个问题上,毛泽东与鲁迅的理解完全不一样。鲁迅对于所谓的“统一战线”的理解,主要还是政治层面上的。他在“两个口号”问题上与周扬等人的分歧,就是由此而起的。周扬把“国防”与“文学”等量齐观,视为一种“同一”的关系,他甚至把“国防文学”视为一种“创作方法”,认为“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②。对此,鲁迅力辨其非:“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即使他像我一样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也未必就是‘汉奸’。‘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③可见,鲁迅所谓的“统一战线”主要还是政治层面上的,对于文艺层面上的“统一战线”,他是有保留意见的。鲁迅之所以坚持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来取代周扬等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就是不能忍受周扬们以“国防”统领文学、“文学”即“政治”决定“文艺”的企图。可以说,鲁迅与周扬等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是为了维护文学的独立性所进行的“护法”之战^④。但毛泽东在这里却与周扬在思想逻辑上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毛泽东虽然也谈到了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但他把“独立性”进行了概念偷换,转换成了“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进而演化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这就与鲁迅的“文学独立性”完全不同了。这也就是说,鲁迅所理解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是文学上的“创作自由”,而毛泽东却理解成了“政治独立性”或“政治立场”。毛泽东和鲁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景下的文艺政策的理解上,看似一致,实际上是“同构而异质”的。但令人玩味的是,毛泽东竟然在这次讲话中把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话语加诸鲁迅:“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⑤

第二篇文献是1939年11月7日毛泽东致周扬的一封信。这封信是毛泽东看了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一文的送审稿后写的。周扬的文章是针对当时“民族形式”讨论中的一些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的。文章原稿是密密麻麻的十一页油印稿,毛在上面批改和批注了几十处,只有一页没有改动。此文后来发表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当然是按毛修改后的稿子排印的。由于特殊的历史缘由,毛泽东这封信一直没有问世。直到2002年,才由中央文献出版社新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首次发表。这封信全文如下:

周扬同志:

文章看了,写得很好,必有大影响。某些小的地方,我认为不大妥当的,已率直批在纸上。其中关于“老中国”一点,我觉得有把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混同,(有)把现代中国的旧因素与新因素混同之嫌,值得再考虑一番。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一农民

① 《鲁迅全集》第6卷,第530页。

② 周扬:《关于国防文学——略评徐行先生的国防文学反对论》,上海:《文学界》1936年6月5日创刊号,收入《“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31—235页。

③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第531页。

④ 参见拙作:《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重新检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1期。

⑤ 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第16页。

(,)亦不宜说只有在某一方面。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是否有当,还请斟酌。

作文当遵命办。

有暇请来谈。

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七日^①

这是毛泽东关于中国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其中牵涉到了鲁迅。信中首先从对于“老中国”的认定入手,认为“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一农民,亦不宜说只有在某一方面。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这就彻底颠覆了“五四”启蒙主义现代性的文化观。“老中国”的提法最早见于“五四”时期。如方璧(沈雁冰)在《鲁迅论》一文中,就认为鲁迅的《呐喊》、《彷徨》,“除几篇例外的,如《不周山》、《兔和猫》、《幸福的家庭》、《伤逝》等,大都是描写‘老中国的儿女’的思想和生活”。其中还对“老中国”作了特别的说明:“我说是‘老中国’,并不含有‘已经过去’的意思,照理这是应该被剩留在后面而成为‘过去的’了,可是‘理’在中国很难讲,所以《呐喊》和《彷徨》中的‘老中国的儿女’,我们在今日依然随时随处可以遇见,并且以后一定还会常常遇见。”^②周扬文中的“老中国”的提法,沿用的还是“五四”时代流行的启蒙主义现代性的话语,隐含着的是对于包括农村在内的传统中国的批判性指向。据整理过毛泽东这份修改稿的龚育之先生记载,毛泽东对周扬文中“老中国”的提法显然是不满意的,而且还作了修改:

最重要的修改,是改掉了原稿中多处“老中国”的提法,改为“自己的中国”、“自己民族自己国家”,或者划去“老”字,并在旁边批道:“不但老中国,而且新中国”,原稿中还有一句:“在它(新文艺)眼前的是旧的人民,他们旧的生活,旧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旧的观念见解、风习、语言、趣味、信仰……”毛在旁边批道:“单拿一个旧字来表现一切,不妥,也与你在前面说道的中国已有新的社会因素不合,抗战这事完全是新的。”大概仍然意犹未尽,所以在信中又做了那样一番发挥。^③

这样一改,农村、农民这些在“五四”启蒙主义现代性话语中被视为传统性存在的“老中国”的内涵,完全被颠倒过来了:农民成了“先进文化”的代表,农村是“新中国”的典范。因为“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是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这就是说,一切“民主斗争”、“民主主义的内容”,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全都是农民斗争,所以,只有农民才是革命的动力、主力。就这样,在毛泽东的笔下,“农民革命”被披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外衣,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

① 《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59页。

② 方璧:《鲁迅论》,《小说月报》第18卷第11期,1927年11月10日。

③ 龚育之:《首次发表的毛泽东致周扬的一封信——读〈毛泽东文艺论集〉》,《学习时报》2002年6月10日。

正是有了上述的理论前提,毛泽东才在给周扬的信中指出了鲁迅的“不足”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这也就是说,鲁迅通过阿Q这个人物,仅仅揭示其身上的“国民的劣根性”或“精神奴役的创伤”是不够的。在毛泽东心目中,像阿Q这样的农民一定是中国革命所倚重的对象,是革命动力和主力,不但不该被批判,而且还要在革命斗争中积极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未来“新中国”的主人。显然,毛泽东是从政治家或革命家的立场去要求鲁迅的。但问题在于,鲁迅首先是小说家,他在作品中岂止是“忽略”了阿Q之流的农民“英勇斗争、反抗地主”的一面,而且还对“阿Q式”的革命做了整体性的否定!他在《阿Q正传》中,不但没有让阿Q在革命队伍中健康成长起来,而且还在最后把他给“枪毙”了。鲁迅让阿Q早早死去,实际上是在“鸣枪示警”。在他看来,中国革命不应该是“阿Q式”的以暴易暴的革命,这样的历史循环该结束了。鲁迅如此描写和“处理”阿Q,既显示出了他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所具有的杰出的才能,更凸显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惊人的预见力。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和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在农民问题的认识上,竟然有如此大的“歧途”!

毛泽东致周扬的这封信还暗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毛为正在构思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曾不止一次地与周扬交换意见。如果说毛泽东在致周扬的信中的“鲁迅论”还只是雏形的话,那么,到了《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的“鲁迅观”基本上已经成熟,而且已经融化到了他的宏大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了。两个月之后,也就是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刊登了该演讲稿。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此文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如果说,毛泽东在1937年的《论鲁迅》中所强调的还是鲁迅的“革命精神”的话,那么到了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主要凸显的还是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化“旗手”的地位。请看下面他这个关于鲁迅的著名的论断: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本来自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处于“敲边鼓”的边缘地位的鲁迅,在毛泽东的话语中顿时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问题在于,鲁迅是什么样的“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呢?如果我们联系上下文来阅读,就会见出,毛泽东话语中的这个“文化革命”,并不包括我们一般所理解的从1915至1918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指的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至1940年这一阶段的“文化革命”:“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的和最英勇的旗手”。这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者的鲁迅”才是最重要的,才可能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显而易见,毛泽东屏蔽的是作为启蒙主义者的“鲁迅”,而凸显的是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鲁迅的理解,是完全按照“六经注我”的方式,从自己革命家或政治家的价值立场出发而对鲁迅进行评说的。毛泽东视域中的“鲁迅”,并不是周海婴心目中的“鲁迅的真精神”,即以“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韧性坚守”为基点的启蒙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的“鲁迅”。毛泽东与鲁迅,两者对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出路,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等方面的看法和主张,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鲁迅所指出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三、为什么是“鲁迅”?

由上所述,毛泽东与鲁迅在基本精神和价值观念上存在着根本性的紧张和冲突,显示出的是他们二者在文艺和政治上的“歧途”。既然他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跑的是两股道上的车,为什么历史要把他们二者拉到一起,成为二而一的整体呢?或者说,既然他们在诸多问题上有根本性的歧异,那为什么毛泽东还是如此重视并高度评价鲁迅,以至于把他送上“神坛”,成为“旗手”,让他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呢?

首先,毛泽东之关注鲁迅,是与他关于中国革命的宏大战略息息相关的。早在1936年11月22日,他就在陕北保安举行的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进行中国革命的“文武之道”：“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内战。”“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①后来，毛泽东的“文武之道”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演化为“两个围剿”的理论，即国民党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变化为“两个总司令”的称呼，即我们有两个总司令，一个是朱（德）总司令，一个是“鲁（迅）总司令”。

毛泽东这一“文武兼备”的革命战略，得之于他早年的宋明理学的训练。早年毛泽东曾从杨昌济等那里接受了系统的宋明理学的传统教育，宋明理学“内圣外王合一”的思想，曾经是青年毛泽东仰止景从的道德理想。这在他1913年10月至12月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学习时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随处可以见出：

十一月十五日，修身：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也，而非圣贤。

十一月二十三日，修身：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者）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者）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②

在青年毛泽东心目中，“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代表是曾国藩。在给好友黎锦熙的信中，他坦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何以哉？这是因为曾国藩能集豪杰和圣贤于一身，内圣外王，君师合一。在毛泽东看来，欲救天下之难，“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大本大源。”何谓“大本大源”？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进一步申说道：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蠹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翳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这也就是说，洞悉宇宙之真理，既有内省之明，又有外观之识，方能“动人心”。获取人心，当为大

① 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第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589—591页。

本,只有内圣,方能外王。“圣人,既得大本者也。”^①可见,“得其大本”的关键是“动天下之心”,而“动天下之心”,思想是其根本。中国革命,仅仅靠武力夺取江山是不够的,要夺取革命的胜利,必须是文武兼备,相得益彰。

“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由保安迁驻延安,从此开始了中共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延安时代”。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给毛泽东寻求“文武兼备”革命方略、建立“大本大源”的革命理论,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这时的毛泽东虽已是中共在军事上的统帅,但在政治思想上还没有树立起真正的权威。在党内,理论上的优势和资源,还掌握在以张闻天、王明、博古等为代表的“留苏派”手里。他们有人曾为此对毛泽东提出了种种讥讽和责难,甚至还给他扣上“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还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等等。为此,毛泽东深受刺激。后来他在一次谈话中提到这件事时曾这样说:“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其中好几封信都有他在延安读书的记载^②。1988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共收录毛泽东批注的哲学读本11种,其中抗战初期阅读的就达9种。1938年2月1日至4月1日,毛泽东还破例写开了《读书日记》,详细地记录了自己阅读李达《社会学大纲》、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等著作的情景。而毛泽东深入地阅读鲁迅著作,也是在这一时期。

毛泽东在延安刻苦攻读的同时,也在构想着重整山河的文韬武略。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与国民党等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势已经形成。如何认识现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如何制定中国革命的策略,尤其是在抗战救国形势下的革命策略?抗战胜利后的“新中国”将是什么样子?如何在经济水平比较落后的形势下实现共产党的理想,即建设社会主义并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等等,这些都是当时亟待中国共产党给予回答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为此,抗战初期的毛泽东进行了长期的理论准备和系统的思考。从1938年10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到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对当前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判断,再到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们可以见出毛泽东在理论上探求“大本大源”的救国之术的思想轨迹。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自然是理论建构的重中之重。如何总结、利用并汲取现代的思想资源以构建自己的新民主主义思想的体系,就成了毛泽东试图寻求并亟待解决的理论文化问题。这时,鲁迅进入到了毛泽东的视野。

毛泽东发现并选择鲁迅,并以之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近几年来使鲁迅颇受一些自由主义者的诟病。他们曾这样发问:“五四那一辈他有很多同道,为什么其他人的民主追求不可能被利用,唯独鲁迅能?”“为什么最硬的骨头会成为打人的棍子”?言外之意就是说,“鲁迅思想的短板”被毛泽东“利用”,最后竟至于“最硬的骨头成为打人的棍子”。而“鲁迅思想的短板”在这些论者看来,就是鲁迅曾经坦言过的“个人的无治主义”即“无政府主义”。而这个“无政府主义”,与毛泽东作为革命家的“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斗争哲学有心心相印之处,这样,毛泽东和鲁迅,就成了精神上的一体之两面,或者说,鲁迅就是通向毛泽东的“独木桥”^③。我们且不论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他的思想的矛盾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并不是这位论者所谓的“个人的无治主义”,更不想过多地纠缠于鲁迅在思想层面上的“个人的无治主义”是否一定就等于政治上的“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一问题的辨析上。在这里笔者更想着重强调的是,毛泽东看中鲁迅,首先是选

① 以上引文均引自毛泽东:《致黎锦熙》(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4—90页。

② 毛泽东:《致易礼容》(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致电彭(德怀)、刘(晓)、李(富春)》(1936年9月11日);毛泽东:《致叶剑英、刘鼎》(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致艾思奇》(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致何干之》(1939年1月17日);毛泽东:《致陈伯达》(1939年2月1日);毛泽东:《致张闻天》(1939年2月20日)等。

③ 参见朱学勤:《鲁迅思想的短板》,《南方周末》2006年12月14日;李劫:《鲁迅:通向毛泽东的独木桥》,见《枭雄与士林——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香港:晨钟书局,2010年,第103页。

中了鲁迅这把“刀子”，如同他利用斯大林那把“刀子”一样。人利用刀子，是看中了刀子的锋利。这一点，毛泽东比谁都清楚。在《论鲁迅》中，他说：“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但问题在于，同样是用刀子，但用处和用法各有不同。毛泽东看中鲁迅的，是他的“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里，“政治的远见”实际上就是后来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立场问题”；“斗争精神”后来在毛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发展成为“硬骨头精神”；“牺牲精神”在“讲话”中被演化成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孺子牛精神”。三者相加，不正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才是毛泽东所着重强调的。通过对鲁迅的修饰和限定，鲁迅这把“刀子”已经变成了毛泽东手里的利器，已经与真正的鲁迅相去甚远了。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和鲁迅，并不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整体，而是两个不同质的精神存在。前面我们已经论及，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出路的眼光和主张，不但完全不同，而且恰好相反。看不到鲁迅在历史上这一被重新“阐释”和“改造”的过程，而把他们视为一体而大加挞伐，其实是一种非历史的短视态度，这才真正是自己“思想的短板”。

当然，我们说毛泽东与鲁迅是两个不同质的精神存在，并不等于说他们两个在所有问题上都是对立，都存在着“歧途”。否则，毛泽东所说的“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这句话就成了不实之论。这里必须申明的是，毛泽东之所以“爱读鲁迅的书”，并“与鲁迅的心息息相通”，是鲁迅著作中那种强烈的“复仇意识”、“斗争精神”、“硬骨头精神”，尤其是其中对于现实世界痛苦而绝望的体验及反抗，一定在一心推翻旧世界的毛泽东的心灵深处激起了强烈的共鸣和激赏。毛泽东之“爱读鲁迅的书”，其心理基础即在于此。这是毛泽东“发现”鲁迅的另一个重要的缘由。但需要指出的是，同样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抗，鲁迅与毛泽东的出发点却不同。鲁迅对现实世界有“恨”，但他是由“爱”而“恨”的，其出发点是仁爱的立场。他说：“创作总根于爱。杨朱无书。”^①所以他的“个人的无治主义”之中又夹杂着“人道主义”，所以他对阿Q等农民的态度才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毛泽东对现实世界的态度主要是恨，仇恨，仇恨导致反抗，而反抗的结果就是让对手臣服，打翻对手，再踏上一只脚。而他在《论鲁迅》中所阐发的那个具有“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的“鲁迅精神”，就是这样一个红色的战神。强烈的复仇和反抗意识，使毛泽东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这与那个信奉“创作总根于爱”的鲁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毛泽东“发现”鲁迅并把鲁迅树为“旗手”，还有一个策略上的考虑。那就是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化思想上崇高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鲁迅在“五四”之后的现代中国的“文豪”地位，他作为左翼文坛盟主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巨大影响，尤其是他去世后以“民族魂”的形象在民众中所赢得的精神领袖的地位，这时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此，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之后的“感言”概括得最为准确。他说：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②

而鲁迅这种超越阶级、政党甚至时代的“民族魂”地位，在抗日战争这一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的特殊时期，其所起到的凝聚人心的精神作用将是难以估量的。这一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那一段著名的“三家”、“五最”论已经指明，此不赘言。那么，如何借重鲁迅这一精神资源并“为我所

① 鲁迅：《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532页。

② 郁达夫：《怀鲁迅》，上海《文学》月刊第七卷第五期，1936年11月1日，收入刘运峰编：《鲁迅先生纪念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99页。

用”呢？对此，“七月派”诗人牛汉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段深中肯綮的看法，他说：“毛泽东 1942 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树鲁迅为旗手（按：应为《新民主主义论》），这些情况，冯雪峰深深知道内情。1934 年他当中央苏区党校副校长时和遵义会议前的毛泽东有较多接触，经常在一起散步聊天。1942 年整风后，延安文艺思想一致了，但国统区、大后方文艺界、文化界对共产党、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还不了解。要找一个众望所归的人来‘统一’。想来想去还只能是鲁迅。”^①牛汉先生晚年曾与毛泽东和鲁迅之间的中介人——冯雪峰有过比较深的接触。冯雪峰许多“心里话”，曾经向他倾诉过。牛汉先生的这段话，其实也是冯雪峰的看法。冯雪峰的弦外之音在于，毛泽东其实并不真正理解鲁迅，他树鲁迅为新文化的“旗手”，是为了“统一思想”而施行的政治谋略。也就是说，“神道”是为了“设教”，“借尸”是为了“还魂”，“鲁迅”这面大旗其实并不重要，关键还在于掌控这面旗帜的人，即掌控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阐释权。而通过 1937 年的《论鲁迅》、1938 年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1939 年给周扬的信，1940 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 1942 年的“讲话”等文章，尤其是通过延安整风对“讲话”精神的贯彻和执行，毛泽东完全掌控了对鲁迅及其作品的阐释权，以毛氏的思维和话语，彻底完成了对鲁迅的精心“打扮”和“改造”。在毛氏话语下的“鲁迅”，已经不是鲁迅之子周海婴笔下那个以“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韧性坚守”为价值核心的启蒙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的“鲁迅”，或者说在许多人心目中那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鲁迅先生，在毛泽东笔下已经沦为“听将令”的“驯服工具”或“共产主义战士”了。通过对“鲁迅”的全新阐释，毛泽东完全实现了对鲁迅所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全面掌控，为他在思想上统一全党乃至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对于鲁迅所采用的这一“神道设教”或“借尸还魂”的文化策略，当时及之后多年来却并不为人所知悉。人们理所当然地相信，毛泽东是鲁迅当然的“知音”或“护法者”，否则，怎么能在《论鲁迅》和《新民主主义论》中给予鲁迅那么崇高的评价呢？“毛鲁一体”，似乎已经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或真理。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会发生解放初在江青与胡风之间的那场冲突。据蓝棣之先生在一篇文章中透露：中央档案馆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献，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给毛泽东说了之后，毛泽东很不高兴^②。其实胡风这里并不是执意要与江青或毛泽东作对，而是他认为“毛鲁一体”才说出了上述的话。解放初的胡风对毛泽东是无限崇拜的，这一点可由其长诗《时间开始了》对毛泽东的热情歌颂来作证。但通过这场冲突，胡风无意间却触及到了毛泽东心灵的最柔软处，或者说他无意间窥探到了毛泽东心灵的最隐秘处，这就为他后来被毛泽东“钦定”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种下了祸根。鲁迅晚年有一篇名文曰《隔膜》，说的是历史上许多不谙世故的文人与圣上之间在心灵上的“隔膜”，而由他最亲密的弟子而生发的“胡风反革命案”，则为其导师的一代名文做了最新的注脚。

胡风上述的“鲁莽”行为固然是由于他自己的“天真”即“不懂历史”之故，但胡风的认识水平在那个时代却是普遍存在的。这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毛泽东 1939 年 11 月 7 日给周扬的那封信中对鲁迅的“微词”，人们还没有机会看到。但更为深层的缘由则是当时共产党还没有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党还在大力吸引并争取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以“鲁迅”的正义形象相号召，其魅力和效果显然是不言而喻的。等到 1949 年以后，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清剿”运动即在全国全面地铺展开来。先是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接着便是文艺界“五大战役”的打响：1951 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 年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倾向”的批判；1955 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清

① 《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北京：三联书店，2008 年，第 116 页。

② 蓝棣之：《症候式分析：毛泽东心目中的鲁迅什么样》，见何梦觉编：《人与神：鲁迅档案》，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2 年，第 216 页。不知蓝棣之先生透露的这份文献所据何在及具体详情如何，如果属实，这当是一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献。

剿;1957年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右派集团”的清理;1958年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在这一桩接一桩的对于知识分子自由倾向的“清洗”中,鲁迅生前最亲密的战友或“弟子”如胡风、萧军、丁玲、冯雪峰、黄源、聂绀弩等无一幸免,几乎是全军覆没。而鲁迅生前的论敌,被他斥为“奴隶总管”的“四条汉子”之首周扬,正是上述这“五大战役”的实施者和总指挥。而发生于1957年7月7日的“毛罗对话”,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据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透露: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①

毛泽东爽快的回答,解决了许多人“口欲言而啜嚅”的疑问,同时也为他自己亲自发动的“五大战役”的初衷作了最好的归纳。不是吗?鲁迅晚年的两大弟子胡风和冯雪峰,正在替自己的老师受过:一个被打成“反革命”,在监狱里继续写作,一个被戴上“右派”帽子,识大体不做声了。历史真的被毛泽东言中了!

综上所述,毛泽东与鲁迅之间,在精神或价值的深处并不是通常所谓的“相得”或“相通”的关系,而是存在着根本性的“隔膜”和“冲突”,即“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无视这一基本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及存在,把毛、鲁视为一体,认为鲁迅是“通向毛泽东的独木桥”,从而对鲁迅恣意拔高或大加挞伐,都是非历史的、更非理性的态度。

[责任编辑 贺立华]

^①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第370—371页。按:周海婴披露的这一段“毛罗对话”,后经几位当事人的证实,已经不是“孤证”,而是历史的“铁证”。但其中仍有一些历史细节问题需要补充和纠正:第一,毛泽东1957年7月7日与罗稷南等会面并不是“要请几位老乡聊聊”,而是正式会见上海各界代表人士,而出席的代表名单中并无周谷城;第二,罗稷南并非湖南人,而是云南顺宁(今凤庆)县人;第三,罗稷南听后并没有“惊出一声冷汗,不敢再做声”,且“对谁也不透露”,还是在晚年乘隙透露给了有关人员。详情见《解放日报》、《文汇报》1957年7月9日,《光明日报》1957年7月11日的有关报道;何圣谟:《“孤证”提供人的补正——对周海婴先生所记述的毛泽东同罗稷南关于鲁迅的谈话的若干补正》,《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陈焜:《关于毛泽东答罗稷南问——致周海婴先生的一封信》,《北京观察》2002年第3期;黄宗英:《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